

牢牢把握“为什么人”这个根本

·成靓·

延安整风期间,为解决文艺界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工作的理论和政策,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毛泽东的论断振聋发聩,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打开思路:从“韩荆州”问题开始

1942年,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周年纪念而写》一文,他认为,“尊重作家先要了解他的作品”,并在结尾处说:“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艾青引用的这句话,出自李白所作《与韩荆州书》,大意是赞美韩朝宗善于赏识提拔人才,希望通过自荐获得机会显露才干,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干事创业的渴望和希望得到尊重的心声。

当时,延安很多人都想找到“韩荆州”,但在方向上出现问题。那么,“韩荆州”应当是谁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朱德首先作出回答:“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几年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也以“韩荆州”问题为例,阐释整风运动时文化界存在的分歧,“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他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

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应深入群众和生活实践,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这也正是毛泽东当时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提出问题:文艺应当“为什么人”

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包括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内,纷纷奔赴延安。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过许多文艺工作者,也多次在讲话中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1940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延安文艺创作逐渐活跃。但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仍保持着原有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问题逐渐暴露。例如,主张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认为作家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会影响写作,主张在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上对待抗战和革命要“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颂德”。文化与党的关系、作家与工农兵结合、提高与普及等问题,作家内部及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亟待解决。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延安

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在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与许多文艺界人士写信、谈话,了解他们的想法。毛泽东坦率地谈及文艺界存在问题,“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1942年春,毛泽东在与艾青交谈时就曾提及,“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

毛泽东在交谈中尤其注意收集大家提出的关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调研,毛泽东深入了解了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并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途径:文艺要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飞机楼”召开,参会的包括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及文艺工作者共百余人。座谈会共进行三次,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议上作讲话,强调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我们不仅要有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我们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群众的



文艺作品《兄妹开荒》演出照

立场。

毛泽东指出,革命文艺作品面向的接受者主要是工农兵及革命的干部,文艺工作者面向人民群众所做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这种工作中第一位的就是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革命文艺作品要为群众所欢迎,文艺工作者就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参会者的思考和讨论。正如何其芳所说:“它使我第一次感到和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必须到工农兵中去向他们学习,同时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参会者对毛泽东提出问题的回应,又为毛泽东此后的总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5月23日,他针对座谈会上讨论的种种问题作出“结论”,进一步强调我们讨论文艺工作,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问题。而问题的中心,就是一个为群众的

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需要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革命的文艺就应当为他们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真正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创作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

焕然一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优秀作品

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实际生活和工农兵群众中去。到1943年春节前后,这时的文艺活动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如文艺与政治密切结合、在文艺创作中表现革命内容,围绕抗战、生产、教育等作为创作主题,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在开展文艺工作的实际行动中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适当吸收利用优秀艺术传统、在文艺工作中结合群众生活的内容与形式等。

《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等文艺作品呈现出崭新面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些作家关注群众生活,创作出反映群众形象的作品,如艾青的《吴满有》,丁玲、欧阳山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等。许多边区的美术作品生动反映边区景象,以新颖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得到群众喜爱,如延安的木刻作品突破原有风格,参考民间艺术传统,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红色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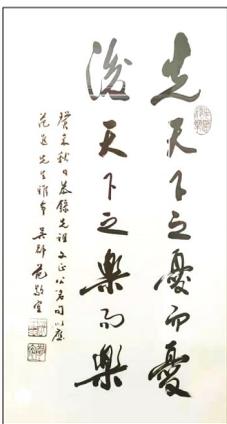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在我家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字(见图),内容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创作者是《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他的行书灵动飘逸,潇洒劲健。这幅字,挂在我的书房已将近19年。

知道范敬宜的名字,应该是在我进入新闻单位不长时间。但真正走近范敬宜,还是在2003年,从他的专栏“敬宜笔记”开始。那时,范敬宜在《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开设了专栏“敬宜笔记”,真正是篇篇小文章,事事大主题,还有作者自然流露的幽默和盎然的生活意趣。

国学大师季羨林在读了《敬宜笔记》后评价:“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季羨林先生曾奉劝《夜光杯》的读者:“见了范敬宜的‘笔记’,千万不要放过。”

而我喜欢上“敬宜笔记”,倒不完全是听了大师的提醒。刨根问底,一是因为范敬宜是同行是



前辈,二是因为自己业余时间也喜欢写些散文。而看他的聊天式笔记文章,总觉得能帮助自己校正业务上、人生中追求的方向。

“敬宜笔记”看得多了,自然有些感想。特别是在看了其中一篇谈及他出身的文章后,我终于忍不住提起笔,我要给范老写信。

范敬宜是苏州人,范仲淹28世孙。而我的家族在每年举行祭祖仪式时,德高望重的长辈坚称我们这一支是“洪武赶散”时,从苏州阊门迁徙而来,

范敬宜先生书赠祖训

·范进·

并认为与范仲淹有血缘关系。当然,对于自己的家谱,我是一时无从考证的,更不敢贸然说自己是名人之后。

虽然是同行,又是本家,但对于范敬宜能否回信,我是不抱指望的。我只是想抒发一个读者的感受而已。当时我从报纸上获悉,范敬宜以72岁的高龄受聘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在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过去之后,古稀之年的范敬宜站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台上,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出人意料的是,2003年10月27日上午,我上班的时候,桌子上赫然放着一封人民日报社印制的牛皮纸信封,几行毛笔写的行书,落款竟然是“范敬宜”。我小心翼翼地封口处整

齐地划开,抽出两张没有打格的信纸。信的开头,范敬宜是这样写的:

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在《新民晚报》上写的那些随笔,不过是遣兴之作,何足挂齿……

说到范氏传承,范敬宜在信里讲述了一件事情:他认识的一位老先生,姓范,寓居香港,也是盐城人。十多年前,此人在内地出资办了20多所希望小学。2002年又在盐城建了一座纪念先人的“范公苑”,落成时邀请范敬宜去参加典礼。但范敬宜没有去。

作为范仲淹的28世孙,向来重情好义的范敬宜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范公苑”落成典礼?范敬宜在信中揭开了谜底:

因为我一直觉得沾祖宗光没有多大意思。名人之后,有好

的,也有坏的,归根到底要看本人。

信的最后,范敬宜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问我,“这样做不知是否太不合潮流?”

季羨林先生称赞范敬宜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我的小说集《爱之经纬》出版后,曾寄赠范敬宜指正,并且请他方便时给我写几句勉励的话。

范敬宜回赠的是一句祖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邀我这个后生共勉。他在信中说:

我的字是改稿子、写信封的字,与书法根本不搭界,承你不弃,只好勉力为之。

他竟然还跟我打“招呼”,“我没有写大幅,以免招‘张扬’之讥……”

2010年11月14日,新华网刊发了题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病逝》的新闻。消息最先在微博上不胫而走,有新闻后辈留言:“您已写入新闻史,今天不需要通稿。”